

當什麼樣的譯者

——重構翻譯楷模敘事

鍾 勇

【提 要】 翻譯行業也有楷模，如眾所周知的嚴復、陳望道、錢鍾書等等，但針對楷模進行的研究不多。本文呈現的這個課題及其研究成果，即使不是翻譯楷模研究首創，也是為數不多幾個之一。課題首先對現行楷模敘事進行解構，以此為基礎並聯系現代社會的發展現狀指出，現有及現行楷模及其敘事已經不能適應高速發展的現代資訊多媒體社會活動，因此有必要編織新的敘事，以此推出新的楷模。經過對社會中真實翻譯實踐進行的考察，我們推出了三個嶄新的譯者楷模，希望藉助新楷模及其敘事的建立，推動翻譯理念的改革以及翻譯培訓方法和方式的改革。

【關鍵詞】 翻譯 譯者 楷模 超翻譯 行動翻譯 活翻譯

【中圖分類號】 H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2 - 0126 - 09

毫無疑問，多個世紀以來，翻譯已經成為一種專業和行業，有人借翻譯以謀生並服務社會，也有人勤學苦練志在成為翻譯名家。既為專業或行業，就涉及到楷模（role model）的問題。所謂楷模，就是個體人用做自我衡量、激勵的參照物。^①再參考 Fisher^②和 Stone^③等學者說法，所謂楷模，實際上就是流傳於人群中，並用做解釋、承繼現實的某種敘事（narrative）。

翻譯的楷模研究，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基本屬於空白。但是，關於翻譯大師（如玄奘、嚴復、林紓、陳望道、錢鍾書等）的主流傳說，廣泛流傳於翻譯界內外，並形成翻譯從業者嚮往的標準、朝之奮鬥的楷模、以及公眾對翻譯的職業要求。除此之外，國內外專家學者和業界前輩對翻譯角色的論述，如將之定位成“螺絲釘”^④或者概括成“窗口”、“橋樑”^⑤等等，實際上也是為翻譯構建的常規敘事主線。

在上述背景下，筆者對現代社會出現的非主流翻譯實踐及其實踐者進行了考察，並在此基礎上整理出四個個案，作為新型翻譯的敘事依據。

關於翻譯的標準敘事及其實例

雖然其類型稍顯單一，國內翻譯專業還是有自己的標準楷模敘事，比如陳望道。關於此前輩，

就流傳著這樣一段傳奇。^④

“五四”前後，同盟會元老戴季陶委託《民國日報》主編邵力子物色合適人選翻譯《共產黨宣言》，條件一是精通外語，二是有相當水準的語言文學素養。最終，陳望道獲選。陳老先生是在上海接受的任務，但卻選擇了回到浙江義烏縣城西分水塘村母親家完成翻譯。他躲進祖屋後的獨立柴房，潛心工作，曾留下了一段“吃墨”的傳說。一天，陳望道的母親送來粽子給兒子充饑，外加一碟紅糖。過了一陣，母親來取碗筷，驚奇地發現兒子滿嘴烏黑，紅糖卻原封未動。老人家愛憐又帶幾分生氣：“吃完啦，這糖甜不甜呀？”陳望道仍渾然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墨汁，頭也不抬：“甜，真甜。”最終，中譯本《共產黨宣言》得以出版，並先後印行 17 版，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啟蒙讀物。毛澤東 1936 年 7 月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表示，這本書幫助他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周恩來也曾說他這一代中國共產黨領袖都是陳望道教育出來的。

這個傳說還有續集，基本不為公眾所知或稱道。譯著出版後，陳望道入黨，並成為中共一大的正式代表之一。一兩年後，他脫黨並重回職業教書和翻譯的人生軌道。直到 1949 年以後，他位至復旦大學校長，還在孜孜不倦地譯書。他的事蹟，可濃縮成一句話：一日翻譯，終身翻譯；身為譯員，委身於人。

上述故事前半部，實際上就是翻譯界用以塑造楷模以求延續本行業的敘事。這個敘事的主角，基本可以由翻譯界裡多位知名大師替換，如：林紓、陳望道、傅雷、錢鍾書、楊絳、許淵沖等。除了主角可以替換以外，這個敘事的其他元素基本穩定。首先，翻譯楷模都是功成名就的文字大師，對於他們，翻譯完完全全就是文字工作，就是把一種語言的文字譯入另一種語言。所需工具不多，如紙筆和字典等，也只是文字器材。其二，他們不但精於母語，外語造詣也是十分了得，能把原著精髓用最貼切的語言忠實地傳達給讀者。這種功力，用翻譯代表人物嚴復的術語來說，就是“信達雅”了。^⑤其三，這些大師基本都是在書齋（或起碼是專門的空間）裡坐著，借助於字典、紙墨等紙媒工具完成大作的——他們基本獨立於讀者，甚至不食人間煙火。其四，他們飽讀詩書、滿腹經綸卻謙虛含蓄甚至羞於外露怯於表達，在專業方面則不屑於喧賓奪主，他們很容易讓人聯想到 Venuti 提出的翻譯“深藏不露”（invisibility）一說。^⑥其五，他們的定位是社會運動或活動的工具，所以，鍾述孔先生提出了翻譯要做螺絲釘（cog and wheel）的說法。^⑦另外還有一個敘事元素，他們通常視翻譯為終身事業，翻譯完一本書再找下一本書翻譯構成其基本的人生追求。

對於翻譯楷模的上述敘事及其元素，當代學者提出了諸多批評。其依據主要包括以下幾點。首先它過度強調原作者和原作的文本意義和文字意義之再現，過於強調翻譯在社會實踐中起到的工具作用，無視翻譯在創造、更新知識中發揮的作用。^⑧在實踐標準和方法方面，它過度強調對於原作和原文的忠實、準確、流暢再現（即常人說的信達雅），將譯者簡單化視作語言傳導器（conduit），^⑨或者簡單將之視作原作的影子，^⑩忽視譯者的主觀能動選擇和讀者在信息生成、傳播過程中的參與。在技術工具和手段方面，它仍停留在二維度的紙筆墨，完全無視當代的網路傳播和全民參與。^⑪在人力資源方面，它提倡的培訓手段過於單一機械，基本上就是“先讀再譯”（read and translate）並欠缺其他教學手段。^⑫筆者借本文再補充一條批評，即這個關於楷模的傳統敘事排他性太強，只有一種楷模，一種工作方法，一種追求，很難適合這個技術日益創新的信息社會，尤其對選修翻譯專業（如國內的 MTI）的學生欠缺相關性。

通過多年的翻譯實踐、翻譯教學、翻譯研究，筆者深知，翻譯所涉及的活動以及譯員的成長，本來就是多樣化的，有多重路徑，並形成多樣化楷模。同時，筆者也關注翻譯專業學生的學

業和就業，以及他們的個人事業發展。在此基礎上，筆者深知，為翻譯專業建立多樣化、真實可信的楷模及其敘事，非常重要。本文收錄了筆者近年建立的四個翻譯楷模案例，其中一號和四號案例使用的素材，我曾對之進行深度理論分析並將分析結果發表在學術期刊上。^⑤本文呈現這些個案的目的，一是為了說明時代不同了，翻譯的工作性質也發生著天翻地覆的改變；二是為了幫助翻譯行業新人更好地認識這個已經被科技和新思潮改變的、並且還在加速改變的社會及其翻譯行業，並在其中開拓出立足之地和事業之途。

個案一：翻譯可以直接改造社會、促其進步

翻譯歷來擔負著改造社會並推動其進步的歷史重任。就是因為翻譯，在中國，先有佛教紮下根來，後又有馬克思主義思想形成氣候，最終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各種思潮薈萃於此形成今日的中國。^⑥但翻譯專業師生常常忽視翻譯的這種先鋒性作用，很多人以為，畢業了就是在政府機構或企業裡找個專職的翻譯工作，職責就是翻譯上司或客戶要求翻譯的文本，然後忠實準確地完成文本翻譯。而且，在他們眼裡，翻譯純粹就是文本文字工作，坐在辦公桌前，靠一臺電腦或一只筆、一疊稿紙、一本字典，只要把一種語言的文本內容用另一種語言不增不減不變地表達出來就行了。

本案例的主人公，走的卻是另一條職業道路。在借翻譯安身立命的同時，他努力將之用於推動社會進步。而且，他的社會實踐還推動了翻譯本身的演變，導致新的翻譯方式產生，即所謂的活翻譯（live translation）^⑦——這後一點，我已作出專門的深度分析，這裡不再贅言，姑且著重探討，他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另類楷模。

袁天鵬 1998 年畢業於北京郵電大學，後出國到阿拉斯加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期間通過學生社團活動接觸到羅伯特制定的會議規則並對之有所瞭解和體驗。後來，袁先生輟學並進入美國公司任職，後又回國效力於某跨國公司任項目官員。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想起《羅伯特議事規則》並想起自己曾經懷抱的報效社會改造社會的抱負，結果是他辭去公司職位，從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羅伯特議事規則》的翻譯、出版和傳播事業裡。

《羅伯特議事規則》的袁譯本於 2008 年正式出版。如果袁天鵬只是又一個老式翻譯，他只要把書翻譯出來，然後等著書印出來，拿到稿費，同時再物色新的翻譯項目就好了。袁天鵬恰恰是個與眾不同的譯者，他不僅把書翻譯成中文並出版，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會議規則的推廣活動中，並將之變成自己的人生和事業追求——這裡不提羅伯特議事規則，是因為他的翻譯以創造新智慧為主。為此，他還成立了專門的諮詢公司，致力於把會議規則更廣泛地推廣到政府機關、社會組織、商業機構，甚至還包括邊遠落後的鄉村。^⑧他既是翻譯，又超出翻譯，而且還成為了社會活動者、創業者、改革領路人。他代表了翻譯的另一種角色楷模，即社會活動家，他所作的是一種超翻譯實踐，即利用翻譯及相關活動促進社會進步並借此確立自己在職場裡的地位。

他的超翻譯實踐基本和當代學術理論同向發展，並非常契合當代人的特點。比如，在翻譯對象方面，他的翻譯是概念先導而非文本先導的。換言之，他是為了研究並最終推廣一種理念和方法而進行翻譯的，而不是像陳望道等傳統翻譯那樣守株待兔等待一本好的原著出現再對其進行翻譯。這使他成為 Baker 所謂的行動主義（activist）譯者。^⑨在翻譯目的特別是意義生成方面，他尊重讀者和聽眾的判斷力和創造力，注重和他們合作制造新的知識產品，^⑩而不是像傳統翻譯那樣閉門造車、照本宣科。為了推廣會議規則，他深入基層、上山下鄉、面對讀者，而不是像傳統翻譯那樣藏身深閨、深居簡出。他每次為推廣會議規則而做宣講，都會預先制定翻譯

方案，包括確定目標、選擇最佳手段，事後還要做出評估，繼而為下一次宣講制定合適的方案；這使他有別於傳統翻譯的“邊看邊譯”的工作程式，體現出很多方案翻譯法^②的特點。在宣講過程中，他有針對性、有目的地使用多媒體、角色遊戲、身體語言、互動活動、模擬演練等等以追求翻譯效果的最大化；這使他有別於傳統翻譯的一枝筆、一疊紙、一本字典的書齋翻譯模式，體現出筆者所推崇的“即時、鮮活、真實”^③的特點。以上介紹還凸顯了袁天鵬超翻譯實踐的另一大特點，他尊重讀者和聽眾，在尋求改變他們的工作方法和生活習慣的同時，也致力於“給力”他們，讓他們一起參與並創造新智慧、新程式、新做法；這也使他有別於那些閉門造車、孤芳自賞、脫離群眾的傳統翻譯，並使他充分體現出當代社會活動所器重的“給力群眾”理論。^④

個案二：有個人風格的翻譯才是好翻譯

按照常規思路，衡量好翻譯的標準就是忠實準確文字優美，套用嚴復的說法，就是“信達雅”，^⑤若是按照 Venuti (1995) 的批評，翻譯通常被視作躲在原作者身後的影子，不能流露自己的痕跡。^⑥因此，翻譯作品裡充斥所謂的直譯、硬譯甚至死譯，還有就是被稱作翻譯腔的沒有文體特點的表達形式，傷害讀者閱讀體驗。即使是比較現代的功能主義翻譯理論，也只是按照文本功能區分三到四種翻譯。^⑦但是，本個案主人公的實踐，說明除了標準的約束和功能種類的制約外，譯者的個人風格也是影響翻譯效果的另外一個係數。

本個案涉及兩個人物，一是譯者繆哲，二是編輯秦穎。他們的事蹟說明：什麼人可以成為優秀的書籍譯者？好譯者是什麼人用什麼樣的標準評出來的？當上了好譯者又怎麼樣？個案根據秦穎文章《繆哲的翻譯經》^⑧整理而成，建議感興趣的讀者參閱原文以獲得更多相關細節。本個案中未注明出處的引言，都出自此文，下面不再單獨說明。

（一）沒風格的譯者沒飯吃

世紀交替前後五、六年，賦閑在家的繆哲一氣翻譯出版多本古典西方社科及散文，其中包括《賽爾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等，而且都是由商務印書館等知名出版社出版。以此看來，繆哲可以稱作是成功專業譯者了。他是怎麼成功的呢？根據現有資料看，他的成功秘訣有三：一是熱情、能力和機遇，二是建立了譯者個人風格，三是以譯書為跳板，能跳多高跳多高。

先說熱情和能力，繆哲於翻譯，“頗以‘傳經’自居，深感有益於人，有益於世”。至於能力，他本非翻譯或外語專業，只因無意中獲贈大批西方圖書，才“下了點功夫學外文。後來興趣‘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翻譯出多本社科經典。無獨有偶，筆者當過譯過書也當過同傳，認識數十位專業譯者或譯員，其中一半以上並非語言科班出身。此中意味，值得翻譯專業學生玩味。

光有熱情和能力還不夠，英雄還需用武之地和機遇。認識秦穎極其出版社並最終得到其他出版機構及人物的賞識，可說是為繆哲鋪平了譯途。有兩點必須補充，其一是有勇氣並且願意毛遂自薦並善於維護和伯樂的專業關係。是他首先寫信給秦穎，推薦原著並拿出試譯稿，後來又和後者保持通信，為的是交流翻譯心得、評估推薦原著、也為了讓編輯加深對自己的認識。其二是他顯現出過人之處，特別是在譯文風格方面。於此，秦穎評價是，他的“譯作是有自己的風格的，正是可以流傳下去的本子”。至於什麼是他自己的風格，根據筆者的判斷，他屬於那種中文修養特別好、文筆裡帶有點文言韻律、通過其譯筆可以體味出其國學基礎的譯者。這可以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英美文學室主任黃梅的評價中看出，繆哲譯筆“的確出手不凡，其中的國語功力，

非我等莫及，令人起敬”。

作為出版社編輯的秦穎，他有兩個說法具有啟迪意義。一是大部頭翻譯書籍的市場日益趨小，且勝任的譯者更少。二是他從來不提譯者的學歷、資格證書什麼的，甚至還對所謂的“知名”譯者表示不屑。他更多的是直接看作品，看到喜歡的譯者就主動找上門邀請。而且，他一旦信任上某個譯者，如繆哲，他就會儘量把機會送給他。

（二）是不是好譯者，有沒有風格，誰說了算？

下一個問題是，譯者是否有實力，有沒有風格，誰說了算？作為出版社的編輯，秦穎之言可供借鑒，讀者口碑也要考慮在內，但不是本文重點，暫且不表。

按照秦穎的說法，譯者好不好？不是自己說了算，也不是他或她的社會名氣所能表現出來的。而是由編輯和同仁說了算。還有關鍵的一點，編輯可能還會對照著原文看譯文，此乃其本職責任，應該的。但是，同仁則常常只以譯文論英雄，這從上面引用的黃梅評語可以看出。即使是為了推薦繆哲的譯作參加一項評獎，黃梅也僅是“找來英文本對讀了幾段”。“對讀了幾段”，僅此而已。但這都在情理之中，在壓力山大的當今社會，誰有那麼多時間和閒暇去對比原文和譯文呢？若果說到讀者，其中的絕大多數更是無緣與原文照面。

綜上所述，譯者的譯入語水準尤其重要。換言之，除了事關公平正義（如法律）、生死攸關（如醫學）的場合以外，若和劉重德、范守義等學者最看重的信與達相比，^⑧譯者具有個性文體和風格更加重要。

（三）翻譯最終只是跳板

關於翻譯，還要說到另外一個啟發：譯書於個人未必就是最佳的職業之途，但一定是很好的事業跳板。筆者本人近雙位數的同傳搭檔，一輩子專做同傳的，也就一二。繆哲譯書，一舉成名，要繼續走下去，估計譯著等身，並非難事。但他急流勇退，據秦穎揣摩，“收入的微薄和院所的歧視，大概也是他無法盡心著譯的原因”。下面據說是他自己的一番表白，轉引自秦穎，亦能表露幾分他的心跡。

蓋譯書之苦，雖與編字典差不多，但報酬之低，遭學術機構的蔑視（不算“成果”），卻有甚於字典的編纂……寫文章的人，不愛憐譯者吃兔子料，卻求為千里足。我怕天下的譯者們臉皮薄，被人一數落，就潛心譯書而至於餓死。或惹惱學校當權的諸公，連猢猻王的位子也保不住。

但譯書可謂是事業之敲門磚，又是千真萬確的，也是經繆哲經歷又一次驗證的。他於秦穎，始為陌路，繼成譯者，後又成了可靠的專家顧問。凡涉及物色原著和譯者之事，秦穎常求教於他。不難想像，只要他願意，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翻譯大師甚至是文化或出版掮客。他和秦穎的合作成果，又導致商務印書館等出版巨頭也向他伸出了合作的橄欖枝。前面提到的黃梅女士，也邀請他北上京城加盟外文所。那麼多的好機會，都先後被他婉拒了？已經站在高水準跳板上的他，跳到了哪里呢？他如今成了中國頂級學府之一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研究中心的主任！

個案三：想像力、計畫力、執行力是成功之母

本個案圍繞著一個畢業生求職的過程展開，並揭示兩個道理。一，有擔當、善於行動並且行必果的畢業生職業機會更光明一點；二，翻譯不是機械的語言轉換，而是智商性博弈活動。本個案在翻譯就業市場日趨緊張的今天^⑨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個案數據是2013年採集的，當

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規模為 699 萬人，是建國以來畢業生最多的一年，被譽為“史上最難就業年”。^④知名調查機構麥可思當年調查報告顯示，截至 4 月 10 日，應屆碩士畢業生簽約率為 26%，同比下降 9%；本科畢業生為 35%，同比下降 12%。

Davis 和 Zhong 批評常規翻譯缺乏思想、技術含量，就是 read and translate，翻譯成“看了就翻”或者“邊看邊翻”。^⑤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所謂的“方案翻譯法”，^⑥將翻譯視作利用智慧進行博弈的過程。其具體操作程式包括如下步驟：接到翻譯任務後，首先對其（包括文本及其客戶要求）進行審閱和思考，在此基礎上根據客戶要求、本人能力、客觀條件和資源制定合理並且最佳化的翻譯方案。方案要包含明確的指標、力爭達到的最佳效果、為達到指標和效果計畫採取的措施和辦法、以及跳出信達雅框框以後如何控制風險等等。

回到本案，先說本案主角鄭某拿到某 985 大學理想職位（留學生項目管理）的經歷。鄭某自小對英語有濃厚興趣，她後來讀大學專修英語，又拿到翻譯研究生文憑。但是，據分析，她能拿到職位的關鍵，卻是在應聘考試中的表現。

這份空缺吸引了三十多申請人，其中含一名男性，另有多名海歸碩士畢業生。據筆者瞭解，那位男性應徵者本來已經被內定為優先人選，只是考試成績太差而使其落選。筆試結果，鄭某獲得最高成績，第二名為一位留學英國兩年的海歸。但名額只有一個，鄭某最終如願以償。綜上所述，在某些需要特殊學歷證明和專業技能而“拼爹”並非絕對重要的時候和場合，抓住機會表現出真才實學，對求職者實在是非常重要的。

當日考試，實屬突然襲擊，甚至有應聘者以為只是開會，直到考官宣佈考試及其要求：筆譯，30 分鐘內完成兩份翻譯。一份是中翻英，內容取自該大學國際交流學院的推廣手冊，篇幅逾 1,000 字；^⑦另一份英翻中，內容和佛教有關，篇幅為 500 字。考卷發出，考場一篇譁然，包括鄭某在內，考生紛紛表示在規定時間內不可能完成如此份量的雙向翻譯。但監考老師嚴肅宣佈：就是 30 分鐘，開始吧！

知道考試強度沒有商量，鄭某靜下心來開始翻譯。她使用的翻譯策略給她幫了個大忙。她將學院宣傳冊和佛教文章分別定位為表達（expressive）和傳達（informative）性文本，對前者進行了編譯，把後者翻譯成要點式（point form）文本。她的實踐，一方面受益於對 Reiss 功能翻譯的瞭解，另一方面也驗證了方案翻譯法的行之有效。經過一番博弈和專注的努力，鄭某居然基本完成了兩份翻譯稿，只有中譯英最後一段來不及翻譯。最後，考試成績排在第一的就是鄭某，空缺最終也落入她囊中。

個案四：書齋翻譯無用武之地

前面是和翻譯成功就業和創業有關的三個個案，最後，我再呈現一個失敗的個案，以此警示未來的翻譯畢業生。個案取自一個真人故事，我曾在一篇關於當今業界所需翻譯技能的論文裡引用過這個案例。^⑧那篇論文通過第一手數據說明，在中國、尤其是在澳洲，翻譯專業畢業生面臨的就業壓力日益增大。在此背景下，本個案主人公之遭遇尤其令人扼腕惋惜。

2010 年的一個星期一，本人正在備課，突然接到一位舊日學生的緊急求救電話。此人任職於澳大利亞最大的投資及財富管理公司之一，任中國市場項目官員。他所在的公司要接待中國某著名人壽保險公司的高層考察團並商談合作事項。為此，他專門聘請了翻譯，是一位有本科專業學歷並通過國家級（NAATI）考試拿到翻譯資格證的翻譯。整個活動計劃持續五天，他聘請的翻譯

只做了半天就做不下去了，儘管他明顯已盡全力。舊生無計可施，只好來電呼救，讓我推薦可以獨當一面之能人。

事後，他給我介紹了事情的來龍去脈。憑本人對澳洲和中國翻譯市場的瞭解，我完全認可他所說之事並相信其極具代表性。澳洲公司一般不會支付昂貴的人工成本聘請專職譯者，他為了找到一個可靠並勝任的人選，專門查閱了全國性翻譯認證公司（NAATI）提供的譯員花名冊並打了一圈電話後。他發現了幾個在他看來難以想像在我看來純屬正常的現象。手冊裡記錄在案的中英翻譯，凡來自悉尼的，大多數聚居在兩三個社會經濟文化水準較低的區域。他電話面試時發現，應徵者普遍語言溝通能力低下，英語表達方式不倫不類，大多數身為應召翻譯並對翻譯以外的其他專業缺乏經驗，基本上只專注某一個或兩個專業（醫療、法庭、社工等）的翻譯，對社會及商業慣例（如：帳單、從業保險、澳洲經商註冊號碼、專業服務收費標準及方式等）幾無瞭解。而且，居然只有極少數的註冊翻譯同時具有筆譯和口譯資格證書。更糟的是，大多數的註冊翻譯居然只有單向（英譯中或中譯英）翻譯資格。

他最後找來的人選還算不錯，雙語和書面翻譯能力較強，曾幫某大學和政府機構翻譯過大量的宣傳手冊。但是，在那個倒楣的星期一，很多倒楣的事不幸湊到了一起，導致應召翻譯的徹底失敗。首先，不善言辭，尤其面對高管說話或翻譯時顯得格外的局促，說出的話斷斷續續的，甚至連聲音都變得刺耳。交替翻譯過程中，他似乎只會忠實準確地使用非常規整的語言逐字逐句翻譯，使譯入語變得非常的冗長和耗時，讓專業知識非常豐富並且粗通英語的中國高管難以接受。座談中間休息時，主辦方請來的發言人需要他把一份十幾頁的 PPT 翻譯成中文，他又要求主辦方提供一間辦公室，讓他可以不受打擾地翻譯。“大學培養的這種昂貴而又饑餓的專業人士到了真實社會裡怎麼生存呀？”舊生不無感慨地說。

四個案例的總結及啟發

本文通過四個個案，塑造出三個和陳望道等標準職業楷模有異的另類楷模，又通過一個失敗的個案，說明常規翻譯模子訓練出來的翻譯已經不再適合這個日新月異的資訊社會。筆者從上述四個個案提煉出如下啟迪，供有志於投身翻譯事業的新人參考。

首先，譯者不僅可以人云亦云，還可以成為思想領袖和意見領袖；既可以充當原作及作者的傳聲筒，也可以有意識地成為新思想的領路人、實踐者、傳播者。現代社會，需要的不僅是書齋型翻譯，社會也需要（甚至是更需要）領導型、參與型、行動型翻譯。這就意味著，翻譯不僅僅是書齋工作、案頭工作、文本工作，還應該面向社會、融入基層、直接接觸讀者和聽眾。翻譯新人，不僅僅要具備優秀的雙語及翻譯功底，還要不斷地鑽研新的理論和思潮，要對社會及社會發展趨勢有更深刻的把握。在人力資源培訓方面，翻譯要努力提高社會活動能力、人際交往能力；要提高多媒體製作和使用能力、語言和非語言表達能力、藝術表現及表達能力；要培養“給力”讀者、“給力”聽眾的能力，學會讓受眾一起參與到新智慧新思想的創造過程。

在專業實踐方面，忠實準確、斟酌詞句的翻譯未必是最好的翻譯。在雙語和多語成為專業常態、機器智能翻譯日益完善的今天，傳統的翻譯（如書籍翻譯）滿足不了日益擴容的翻譯人力資源，也滿足不了現代各專業的技術和強度要求。要想成功，翻譯一方面要努力培養出自己的風格和文體，另一個方面要學會做一個能力強、善於行動、變通性強、善於多種方式多種媒體表達的專才。

在翻譯培訓擴容的同時，現代社會對傳統型翻譯人才的需求也在減少。這意味著傳統的終身書齋型翻譯機會越來越少，新入門者若要成功，必須成為領導者、思想者、文筆有風格有個性的人、能行動並且行必果的人。這方面，還有更多的另類楷模可以成為借鑒。比如，外語專業出身的馬雲做過翻譯並借之把握住社會發展的走勢並最終建立起電商王國，比如紅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用翻譯服務盲人造福社會，又比如還有學者建立各種語料庫並將相關技術用於翻譯及語言服務以使其經濟利益最大化。

-
- ①Robert K. Merton, *Mass Persuasion*,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6; Yong Zhong, Looking for Cadeer: Critiquing A Prolonged Search for A Model Used for Mass Persuasion in China, *Critical Arts: South-North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2012, 26 (4), pp. 606-622.
- ②Walter R. Fisher, Narrative As A human Communication Paradigm: The Case of Public Moral Argument,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984, 52, 347-367; Walter R. Fisher, *Human Communication as A Narration: 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 Value, and Action*,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87.
- ③Lawrence St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1979, (85), pp. 3-24.
- ④⑨Shukong Zhong, *A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0.
- ⑤Cynthia B. Roy, The Problem with Definitions, Descriptions, and the Role Metaphors of Interpreters,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344-53.
- ⑥有關這個傳說的詳情，可搜索查閱眾多網上資料，包括此鏈接：http://www.wenming.cn/djw/sy/tjq/dszl/ddls/lsta/201605/t20160526_3385364.shtml
- ⑦王棊編：《嚴復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⑧⑫⑮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or*, London: Routledge, 1995.
- ⑩Mona Baker, forthcoming, (ed.) Call For Articles for A Special Issue, *Alif*, 38, available at: <http://www.monabaker.org/?p=1449>; Yong Zhong, Translate Live to Generate New Knowledge: A Case Study of an Activist Translation Project, *Translation Spaces*, 2016, 5 (1), pp. 38-58.
- ⑪Cynthia B. Roy, The Problem with Definitions, Descriptions, and the Role Metaphors of Interpreters, in *Interpreting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⑬⑰Yong Zhong, Translate Live to Generate New Knowledge: A Case Study of an Activist Translation Project, *Translation Spaces*, 2016, 5 (1), pp. 38-58.
- ⑭Maria G. Davies, *Multiple Voices in the Translation Classroo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Donald Kiraly, *Pathways to Translation: Pedagogy and Process*, Kent, Ohio & London: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⑮Yong Zhong, Capacities expected of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ents, *T&I Review*, 2013 (3), p. 208; Yong Zhong, Translate Live to Generate New Knowledge: A Case Study of an Activist Translation Project, *Translation Spaces*, 2016, 5 (1), pp. 38-58.
- ⑯我在此說的都是人盡皆知的常識，自然，也多有學者對此早有定論，其中包括鄒振環：《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年。
- ⑰包括安徽的南塘村，詳見註⑮和翟明磊發表在《南方週末》的專題文章。
- ⑱Mona Baker, Translation and Activism: Emerging Patterns of Narrative Community,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2006, 47 (3), 462-484.
- ⑳比如，他在安徽南塘的超翻譯活動，最後和村民合作生成《南塘13條》，而非單純的《羅伯特議事規則》中文譯本。
- ㉑㉒關於方案翻譯法的介紹請看鍾勇：《四種典型思潮指導下的翻譯實踐及結果比較》，北京：《中國翻譯》，2014年第1期；Yong Zhong. Plan-Base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An Alternative to the Standard-Based Cut-the-Feet-to-Fit-the-Shoes Style of Assessment, *Meta*, 2005, 50 (4), unpaginated; Yong Zhong, Assessing Translators vs Assessing Translations: Discussions and A Case Demonstration, *Translation Ireland (Special Issue: New Vistas in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2006, 17 (1), pp. 151-170.

②Yong Zhong, Translate Live to Generate New Knowledge: A Case Study of an Activist Translation Project, *Translation Spaces*, 2016, 5.

③ 所謂的“給力公民”，是筆者對英文概念 empowerment 做出的中文翻譯。更多關於袁天鵬實踐是如何給力公民的詳情，請看註腳13 和17。

④Yuen Ren Chao, Dimensions of Fidelity in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Chines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69, (29), pp. 109-30.

⑥Katharina Reiss, *Text Types, 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 translated by A. Chesterman, in A. Chesterman (ed.) 1977/89, pp. 105-15.

⑦秦穎：《繆哲的翻譯經》，廣州：《南方週末》，2013年7月11日。

⑧劉重德：《翻譯原則芻議》，北京：《中國翻譯》，1983年第4期；范守義：《評翻譯界五十年（1894~1948）的爭議》，北京：《中國翻譯》，

1986年第1期。

⑨筆者曾調查澳大利亞和聯合國兩個用人區域和機構，發現這兩個用工市場裡給中英翻譯提供的就業機會都非常有限。詳見：Yong Zhong, Capacities expected of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ents, *T&I Review*, 2013, (3), pp. 85-108.

⑩參見劉斌的新聞故事《找工作的年輕人》，廣州：《南方週末》，2013年6月27日。

⑪Maria G. Davies, *Multiple Voices in the Translation Classroom*,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Yong Zhong, Struggling Between Aspirations to Innovate and the Tyranny of Re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preter Education*, 2010, (2), pp. 165-175.

⑬原文參見：<http://sice.lzu.edu.cn/about/1/>

⑭Yong Zhong, Capacities expected of Chinese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ents, *T&I Review*, 2013, (3), pp. 85-108.

作者簡介：鍾勇，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UIVSW）研究員。

[責任編輯 桑海]